

# 現代漢語中的幾個語法術語 與漢譯佛經的關係

王 慶

**內容摘要：**在漢語中，“語法”一詞最早出自漢譯佛經，但不是梵文“vyākaraṇa”的意譯。另外，語言學上“能指”和“所指”兩個術語的漢譯名中“能”和“所”的用法也可能源自漢譯佛經。

**關鍵詞：**語法 能指 所指 漢譯佛經

—

孫良明先生有篇文章，講有關“漢譯佛經對梵文語法介紹”的問題，認為漢語中“語法”一詞最早出自漢譯佛經，是梵文“vyākaraṇa”的意譯<sup>①</sup>。之後，王邦維先生也撰文指出，漢語中“語法”一名最早的出處是在漢譯佛經，但不贊成“語法”是梵文“vyākaraṇa”的意譯，而是“中外僧人以及參與譯經的文士們在一起創造出來的一個新詞”<sup>②</sup>。筆者同意王先生的意見，認為“語法”最早出自漢譯佛經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否梵文“vyākaraṇa”的意譯就要謹慎了。

“語法”一詞的最早出處目前可以追溯到鳩摩羅什所譯《大智度論》卷44（《大正新修大藏經》卷25，380頁）：“天竺語法，眾字和合成語，眾語和合成句。”羅什大師譯經力主意譯，此處的“語法”一詞可能是他根據當時的漢語造詞習慣臨時創造

出來的，尚不能說是有意識地對譯梵文中“vyākaraṇa”一詞（因為當時的梵文原本現在無從查尋，故祇能推測）。梵文“vyākaraṇa”一詞在佛經中經常遇到，其最常見的意思漢譯為“授記”，《妙法蓮華經》有“授記品”，梵文作“vyākaraṇa-parivartto”<sup>③</sup>。漢譯佛經中真正可以確定作英語“grammar”講的“vyākaraṇa”筆者目前尚未發現用例，但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在講到梵文的語法書時說：“印度梵書名為記論，其源無始，莫知作者。……其言極廣，有百萬頌。即舊譯云《毗伽羅論》者也。然其音不正，若正應云《毗耶羯刺誦》，此翻名為《聲明記論》，以其廣記諸法能詮，故名《聲明記論》。”<sup>④</sup>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認為“vyākaraṇa”應譯為“毗何羯喇拏”，“舊云毗伽羅論，音訛也。”王邦維注認為“‘vyākaraṇa’或譯為‘記論’”<sup>⑤</sup>。可見，梵文中與英語中“grammar”同義的“vyākaraṇa”在漢譯佛經中或音譯為“毗耶羯刺誦(vyākaraṇam)”，或音譯為“毗何羯喇拏”，或音意合譯為“毗伽羅論”，或意譯為“記論”，或意譯為“聲明記論”，從不意譯為“語法”。

一般認為，中國語法學的創立自1898年出版的《馬氏文通》始。但此時及此後一段時間，在漢語中同英語的“grammar”相當的一般是“文典”，而不是“語法”<sup>⑥</sup>。如來裕恂的《漢文典》(1902)，章士釗的《中等國文典》(1907)，戴克敦的《國文典》(1913)，俞明謙的《國文典講義》(1918)。“五四”以後則多作“文法”，極少作“語法”<sup>⑦</sup>。“一九二〇年一月，教育部訓令全國各國民學校先將一二年級國文改為語體文。一九二〇年四月，教育部又發一個通知，明令國民學校除一二年級國文科改為語體文外，其他各科教科書，亦相應改為語體文。”<sup>⑧</sup>之後，一下子以“國語文法”、“白話文法”、“語體文法”為名的語法書或文章開始大量出現。如劉復的《中國文法通論》(1920)，李直的《語體

文法》(1920)，楊樹達的《中國語法綱要》(1920。在當時，用“語法”命書名，這是一個特例)，胡適的《國語文法概論》(1921)，陳承澤的《國文法草創》(1922)，金兆梓的《國文法之研究》(1922)，黎錦熙的《新著國語文法》(1924)，楊樹達的《高等國文法》(1930)，劉復的《中國文法講話》(1932)，楊伯峻的《中國文法語文通解》(1936)，王力的《中國文法學初探》(1936)，王力的《中國文法中的係詞》(1937)，何容的《中國文法論》(1942)，呂叔湘的《中國文法要略》(1942)。到1943年，王力的《中國現代語法》出版(然而，王力這部著作是他1938年秋在西南聯大“中國文法研究”課程的講義的基礎上產生的<sup>⑧</sup>)，“語法”一詞纔逐漸取代“文法”，如王力的《中國語法理論》(1944)，高名凱的《漢語語法論》(1948)。由此可見，“語法”絕非梵文“vyākaraṇa”的意譯。

## 二

如果說現代漢語中以“語法”取代“文法”表示“語言的組織構造法則及規律”與羅什大師等首創“語法”一詞是不期而然的話，那麼語言學上“能指”和“所指”兩個術語的命名卻並非出於偶然。筆者在讀書過程中發現，語言學上“能指”和“所指”兩個術語也與漢譯佛經有關。

索緒爾(F. de Saussure)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中區分了兩個術語“signifiant”和“signifié”。高名凱先生分別譯作“能指”和“所指”。關於“能指”和“所指”兩個術語的譯名，我們有兩種推測：一，高名凱先生得靈感於佛家術語；二，高名凱先生借鑒了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的日文譯本中的譯法。1928年日本學者小林英夫將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譯成日語(東京岡書院版)。筆者未能查到1928年的日文版，但據

1954年岩波書店出版的小林英夫日譯本《ソユール言語學原論》(即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法語原文中“signifiant”和“signifié”在日語中分別被譯作“能記”和“所記”(“signe”譯作“記號”)⑤。20世紀50年代,方光燾先生根據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的小林英夫日譯本(1928)選譯了部分章節,“signe”、“signifiant”和“signifié”的譯名因襲了小林英夫の日語譯法,分別被譯作“記號”、“能記”和“所記”⑥。我們估計,高名凱先生取法於佛家術語的可能性不大,因為他從法國回國後,一度主要從事巴爾扎克法文著作的中譯,沒有文獻顯示他曾受到佛經的影響。高先生很可能是借鑒了日語中“signifiant”和“signifié”的譯法,略做修改,翻譯成了“能指”和“所指”。高先生在《德·索緒爾和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文中說,“這部書主要是根據法文原本翻譯的,也參考了日、德、俄、英等譯本。”⑦因此,高名凱先生的“能指”和“所指”的譯名很可能是借鑒了日語中的譯法。但日語中“能記”和“所記”的譯法則可能是取法於漢譯佛經中“能+V”和“所+V”的類似搭配用法,因為日本引進並接受佛教曾經過漢譯佛經的中介。王夫之在《尚書引義·召誥無逸》中說,“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釋氏為分授之名,亦非誣也。”在佛典翻譯過程中,譯師們對漢語進行了創造性地使用,創造了一些佛學新詞和術語,至今還在使用,如:體、用;相(對)待、絕待;能、所。蘇淵雷先生指出,“自佛學輸入,名相分析日益繁複。一曰世界,二曰體用,三曰色心,四曰能所:莊生稱:‘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佛家則曰‘能所’。主觀與客觀,感覺的物件與物件的感覺,彼是相生而達對立的統一,人類認識始有可能。佛學建立‘心王’、‘心所’的分析,更為認識論添入新的內容。”⑧在漢譯佛經中,“能”表示主體、主動、主觀性,“所”表示客體、被動、客觀性,隨着“能”、“所”這種用法在漢譯佛經及中土佛教

撰述中的進一步定型，兩詞發生了進一步的語法化，幾乎成了表示“主體”和“客體”的兩個詞頭。“二法對待之時，自動之法謂為能，不動之法謂為所，如能緣、所緣；能見、所見等。”<sup>④</sup>由這兩個詞素構成的詞組或單詞在佛經中十分豐富，如：

能別、所別：

能別不極成，所別不極成，俱不極成，相符極成。（玄奘譯《因明入正理論》。《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32，11 頁中）

能乘、所乘：

若就妄而念，苦集滅道十二因緣六波羅蜜是所乘之法；聲聞緣覺及諸菩薩是能乘之人。（慧淨《心經疏》<sup>⑤</sup>）  
菩薩修道，了達人法二空，已入七地，得無生忍，反觀能乘所乘，如夢如幻。（同上）

能成立、所成立：

云何論所依。當知有十種。謂所成立義有二種，能成立法有八種。（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卷 15，《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30，356 頁下）

能化、所化：

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sup>⑥</sup>）  
此乃是所化眾生，非是能化之佛。（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35，170 頁）

能離、所離：

向來所舉菩薩能離所離，除妄證真，差別不同。（慧淨《心經疏》）

能立、所立：

似異法喻亦有五種，一所立不違，二能立不違，三俱不違，四不離，五倒離。（玄奘譯《因明入正理論》，《大

正新修大藏經》卷 32, 12 頁中)

能破、(所破):

復次若正顯示能立過失, 說名能破。謂初能立缺減過性, 顯示此言開曉問者, 故名能破。(玄奘譯《因明入正理論》,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32, 12 頁下)

(能攝)、所攝:

問三種自性相等五法。初自性, 五法中幾所攝, 答都非所攝。問等二自性幾所攝, 答四所攝。問等三自性幾所攝, 答一所攝。(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卷 74,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30, 704 頁下)

能熏、(所熏):

種與色識常互為因, 能熏與種遞為因故。(玄奘譯《成唯識論》卷 4,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31, 19 頁下)

(能依)、所依:

諸心心所皆有所依, 然彼所依總有三種。(玄奘譯《成唯識論》卷 4,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31, 19 頁中)

此中言名言決有所依止, 以依他性為所依, 由有依他性故得立名。(真諦譯《三無性論》卷上,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31, 871 頁上)

能引、所引:

無明與行為能引, 識名色六處觸受, 此五果種子為所引。(慧淨《心經疏》)

能緣、所緣:

心識曰能緣, 心識之所對云所緣。“能緣所緣, 兩俱不實, 無有二相, 猶如虛空。”(同上)

能照、所照:

一為能照, 即深般若, 二為所照, 即五蘊等法。(同上)  
此外, 像能變、所變、能詮、所詮、能住、所住、能持、所

持、能遍計、所遍計等在佛教經典中還有很多。“能”、“所”的這種用法不僅被大量用在佛學著作中，也經常出現在一些後世非佛學的著作中。陳寅恪先生在論白居易《琵琶行》“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幾句時說：“則既專為此長安故倡女感今傷昔之作，又連縮己身遷謫失路之懷。直將混合作此詩之人與此詩所詠之人，二者為一體，真所謂能所雙亡，主賓具化，專一而更專一，感慨復加感慨。”<sup>⑩</sup>

至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語言學中“能指”和“所指”兩個術語的漢語譯名很可能是受了日語譯名“能記”和“所記”的影響，而日語“能記”和“所記”中“能”、“所”的這種對立搭配用法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佛經的翻譯。

〔注釋〕

- ①孫良明．中國古代語法學探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151．又孫良明．隋唐漢文佛典對梵文語法的較詳介紹及其對中國古代語法學發展的影響．古漢語研究，1999（4）；2000（1）．
- ②王邦維．漢語中‘語法’一名最早的出處．//漢語史學報．第二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 ③蔣忠新編注．民族文化宮圖書館藏梵文〈妙法蓮華經〉寫本．拉丁字母轉寫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129．
- ④孫毓棠，謝方點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75．
- ⑤王邦維．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188—189．
- ⑥現代漢語中以“文典”稱呼英語中“grammar”的意思可能是受到日語中“文典”用法的影響．來裕恂留學日本，見到日本有“涅氏《英文典》、大槻氏《日本文典》”，且以為“豬狩氏之《漢文典》、大槻文彥之《支那文典》、岡三慶之《漢文典》、兒島獻吉郎之《漢文典》類，皆以日文之品詞強一漢文，是未明中國文字之性質，故於

字之品性，文之法則，祇刺取漢土古書，斷以臆說，拉雜成書。非徒淺近，抑多訛舛”（來裕恂《漢文典·序》，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乃作《漢文典》。章士釗的《中等國文典》也是為了在日本教女留學生而編寫的（方光燾，《語法論稿》，1990：6）。

- ⑦許世瑛著《中國文法講話》（臺灣開明書店，1977：1）認為，“黎錦熙氏著國語文法，楊師遇夫（樹達）先生著高等國文法，都稱文法，直到王師了一（力）先生著中國現代語法，纔有‘語法’這個名稱”。事實並不盡然。王力《中國現代語法》出版前，多用“文法”，偶有用“語法”者，如楊樹達的《中國語法綱要》；王力《中國現代語法》出版後，“語法”漸行，但仍有用“文法”名書者，如陳望道《文法簡論》（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
- ⑧王均主編。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46。
- ⑨王力。中國古文法·序。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 ⑩在目前我所見到的日文版的語言學著作中，如定延利之著《よくわかる言語學》（《簡明語言學》）和小泉保著《言語學入門》，“signifiant”和“signifié”分別有幾種不同的譯法：能記/所記；記號表現/記號內容；シニフィアン/シニフィエ。
- ⑪方光燾。語法論稿。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286—290。另，1989年版和1999年版的《辭海》都以“能記”、“所記”為主詞條，以“能指”、“所指”為附見條，當是採用了方光燾先生的譯法。
- ⑫高名凱。高名凱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667。
- ⑬蘇淵雷。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19—20。
- ⑭實用佛學辭典。縮印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⑮方廣錫。般若心經譯注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⑯釋氏十三經，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131。
- ⑰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49。